“清代道藏”——江南蒋元庭本《道藏辑要》之研究*

[意] 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撰**, 万钧 译, 莫尼卡 校

提 要: 继明代《正统道藏》之后,《道藏辑要》是最重要的道教丛书。《道藏辑要》一书的形成至今仍是个谜,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它有三个主要版本: 一为彭定求 (1645–1719) 编原本, 二为蒋元庭 (1755–1819) 增补本, 三为贺龙骧、彭瀚然最终修订本。与学者们普遍认可的观点不同, 本文力图证明《道藏辑要》实际上只有两个版本 (版本二和版本三), 而所谓的彭定求本纯属虚构。在对蒋元庭之同代人闵一得 (1748/58–1836) 的作品进行研究后, 我们证实蒋元庭确是《道藏辑要》的编者。在闵一得的作品中, 我们还可以发现《道藏辑要》在江南地区与“吕洞宾崇拜”有关之道教社团中的影响; 在巴黎藏本《道藏辑要》(这一版本与藏书家 福保编制目录之版本十分近似) 中, 这种影响的痕迹更是十分明显。在此发现的基础上, 本文力图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使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道藏辑要》的复杂文本历史, 以及它在推动清代道教纯粹远景及扶鸾崇拜中的角色。

Monica Esposito,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副教授, “《道藏辑要》研究计划”项目主持人。万钧,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 蒋元庭 闵一得 福保 道藏辑要 巴黎藏本 扶鸾 吕洞宾崇拜

继明代《正统道藏》(1445) 之后,《道藏辑要》可谓是最重要的道教经藏。迄今为止, 它是近代道教经典收藏量最大的选集, 同时也是研究明清 (14 世纪至 19 世纪末期) 道教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虽然《道藏辑要》所选录的经典大多见于明代《道藏》, 但其中也有不少明《道藏》之外的新出道经, 因此《道藏辑要》无疑是明清时期最有价值的道经选本。《道藏辑要》所收典籍门类众多, 既有内丹学、宇宙论、道教哲学、科仪戒律, 又有儒释道三家经典注释、道士传记、地方志、碑铭等, 不一而足。

虽然《道藏辑要》是中国明清时期最重要的道教经藏, 很多学者也频繁引用其中的道经, 但是迄今为止, 学术界对《道藏辑要》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①。《道藏辑要》选经的标准、它的历史以及版本的种类等问题都没有最后的结论。《道藏辑要》的一些“珍本”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欧洲的图书馆还有收藏。在探讨这些未解问题之前, 有必要先简述一下前人关于《道藏辑要》编纂历史的主要观点。

关于《道藏辑要》的编纂历史, 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从最近的论文来看②, 学术界普遍认为《道藏辑要》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1. 1700 年左右由彭定求 (1645–1719) 编辑的版本, 所收 200 种道经全部取自明《正统道藏》③。2. 嘉庆年间 (1796–1820) 由蒋元庭 (蒋予蒲, 1755–1819) 编辑并刻版印刷的版本, 其中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经 79 种④。3. 1906 年贺龙骧与彭瀚然于四川成都二仙庵以《重刊道藏辑要》为名重编的本子, 据称包含各种道书 319 种⑤。

第二种说法: 1955 年, 吉冈义丰在他的《道教经典史论》中指出:《道藏辑要》只有两个版本 (即第二个版本与第三个版本), 现存的版本 (即第二个版本) 为蒋元庭所编, 包含道书 173 种, 全部取自《道藏》。1821 年至 1900 年之间, 蒋元庭的版本被重刻两次, 增加 96 种藏外道经, 使总数达到 269 种。1906 年编辑的《重刊道藏辑要》又增收了 18 种藏外道经, 这样总数变成了 287 种⑥。在吉冈义丰的研究基础上, 柳存仁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认为并不存在由彭定求编辑的第一个版本⑦。

第三种说法: 1996 年, 丁培仁通过对四川省图书馆藏《道藏辑要》版本 (即严雁峰家藏本, 是《重刊道藏辑要》的底本) 的考证⑧, 证实《道藏辑要》实为蒋元庭所编。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 这部经藏“只避康熙、乾隆等讳而不及道光以下, 当是蒋元庭刊本”。按照丁培仁先生的观点,《道藏辑要》应该包含 204 部藏内道经和 93 部藏外道经。这就意味着这部《辑要》一共有 297 种道书。另外有 17 部藏外道经收录在 1906 年的《重刊道藏辑要》中, 共计 314 种。

以上这些观点哪个是正确的? 谁才是《道藏辑要》的最初编者? 该经藏被校订了多少次? 其中究竟包含多少道经?《道藏辑要》所录道经有多少取自《道藏》? 有多少是藏外道经? 贺龙骧编辑的《重刊道藏辑要》增加了多少道经?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笔者在一篇相关文章中已经对《道藏辑要》和《重刊道藏辑要》的现存版本问题，以及藏内道经和藏外道经的数量问题作了分析，并认为上述学者关于《道藏辑要》作者及版本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还值得商榷[9]。本文将针对几个有关《道藏辑要》的编者及其内容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通过对现存《道藏辑要》版本的研究，笔者的观点同吉冈义丰一样，认为彭定求编辑了第一个版本的说法纯属臆造，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版本。蒋元庭本(即第二个版本)才是所有流通版本的底本，虽然这一版本比较难得，但它却是 1906 年《重刊道藏辑要》(即第三个版本)所依据的底本[10]。

然而，如果这一结论可以轻易得出，为何当今的重印本《重刊道藏辑要》上出现的编者名字依然是彭定求，而不是该经藏的最初编者蒋元庭呢？这个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又何以会延续至今呢？我们如何才能证明《道藏辑要》是蒋元庭所编？我们或许应该从据称是《道藏辑要》编者的彭定求开始，来探寻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

臆造的编者彭定求或彭文勤

如果我们在世界多个图书馆的因特网数据库中搜索“道藏辑要”，就会发现其作者多显示为“彭定求”或“彭文勤”[11]。例如，彭文勤的名字出现在台北考正出版社(1971 年版)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1983 和 1986 年版)影印本《重刊道藏辑要》上[12]。这如何解释呢？

1892 年，阎永和成为成都二仙庵道观主持，他决定重刊《道藏辑要》，遗憾的是，当时经板已经损坏，所以他决定重新刻板[13]。新版《重刊道藏辑要》以四川严雁峰藏本为底本[14]，得到彭瀚然的资助，并由贺龙骧校刊全书。据贺龙骧说，这个藏本的编者为“彭定求”。关于该书目录，贺在《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序》(1906)中说：“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辑要》一书，为世称快。惜原书《总目》，止载卷数，未列子目。”[15]关于其内容，贺龙骧在《钦定道藏全书总目录序》中说：“相国彭定求所编《道藏辑要》，出于坊间本者亦半。虽坊本亦皆纯正精粹，然非《道藏》所有。”[16]

贺龙骧两次提到《道藏辑要》的编者是彭定求，并冠之以“相公”、“相国”的称谓。在 1906 年《校勘道藏辑要书后》中，他再次使用了“相国”的称谓，但这次所用的名字却是“彭文勤”：“闻二仙庵重刊相国彭文勤《道藏辑要》，心辄慕之。”[17]

在彭定求的传记中，并未出现过“相国”这一官衔，也没有出现“文勤”[18]这一名字。相反，“文勤”的谥号却出现在彭定求之孙——彭启丰(1701－1784)的传记中，也出现在彭元瑞(1731－1803，南昌人，1757 年中进士[19])的传记中。万德凯在其最近完成的研究《道藏辑要》的博士后论文中指出，在贺龙骧的两篇序言中，彭定求的角色是“编”或“撰”(即“编者”，如言“彭定求所编《道藏辑要》”、“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辑要》一书”)。但贺龙骧在唯一一篇提到彭文勤的文章中，只写了“彭文勤《道藏辑要》”。根据万德凯的说法，这或为贺龙骧在抄写人名时出现笔误所至，或为《辑要》之一传本同彭文勤有关[20]。如果贺龙骧文中的“彭文勤”指的是彭启丰，那么就很有趣了，因为彭启丰的家中应该保存有一个《全书宗正》的古版。正如《道藏辑要》的诸多序言中所说，此版本正是蒋元庭编辑《全书正宗》所依据的底本之一，而《全书正宗》乃是蒋元庭编辑《道藏辑要》时最为倚重的一部书[21]。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很难了解贺龙骧将彭氏确定为《辑要》编者的真实根据，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彭定求和他的孙子彭启丰一样，与道教有着确定无疑的关系。

彭定求字“勤止”、“访濂”，号“南畇”，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隶籍卫所，1676 年或 1686 年考中进士[22]，授北京翰林院援修撰。师事汤斌(1627－1687)，倾心于王阳明心学，同时为一道教信徒[23]。1674 年他在家乡参加斋食活动，与文人尤侗(1618－1704，字梅庵)创作了很多道诗[24]。在《道教辑要》中，他的名字不仅与新增道经《真诠》相关，而且作为扶鸾坛主[25]，还传授文昌帝君善书[26]。

正如金仑寿所指出，依据《道藏辑要》中这些文字，贺龙骧可能将整部经藏的编者误认为是彭定求[27]。我们之所以说是“误认”，因为无论是从《道藏辑要》的内容，还是序跋中都能寻出真实作者的痕迹。在探寻和分析这些痕迹之前，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闵一得(1748/58－1836)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毫无疑问是确定《道藏辑要》真实作者身份的证据。

在江南发现的蒋元庭本《道藏辑要》

闵一得是清代全真教龙门派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多次提到《道藏辑要》[28]。作为金盖山龙门派第十一代祖师，他收集并整理了龙门派有关内丹的道经，同时也非常关注当时在江南地区流传的道经。闵一得曾言及他的《古书隐楼藏书》中有两篇收自《道藏辑要》，即《阴符经玄解》和《金华宗旨》。

第一篇《阴符经玄解》是范宜宾(1722)的一部经注。他在跋中提到该篇由蒋元庭编辑，并被收入《道藏(辑要)》[29]。闵一得在他的序中说明，他在范注后加入了自己的正义，命名为《阴符经玄解正义》。闵注的依据是《阴符经》的诸多训诂注释，如《十真集解》及张果和王道渊注等，这些作品也都收在《道藏辑要》[30]。闵一得在序中，简称“道藏辑要”为“道藏”(这同蒋氏在其跋中所述一样)或“辑要”。

第二篇《金华宗旨》是蒋元庭编辑的，如闵一得在该篇题下明确标注：“《吕祖师先天虚无太一金华宗旨》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蒋侍郎元庭先生辑，金盖山人闵一得订正。”[91]闵一得还言及该书与《道藏辑要》的关系:“是书出处于康熙戊辰，金盖龙峤山房宗坛所传，本山先哲陶石庵先生寿诸梓。嘉庆间，侍郎元庭先生得传抄讹本，纂入《道藏辑要》。”[92]

由此可见，闵一得对《道藏辑要》的内容相当熟悉，至少对他感兴趣的道经非常了解。依照闵一得的观点，这部清嘉庆年间的《道藏》是由蒋元庭所辑。另外，闵一得言及蒋元庭还编纂了一部吕祖的训经——《吕祖天仙正宗内集》。此书是他的经释《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的主要依据[93]。

蒋氏作为吕祖天仙派的一员，还编辑了《吕祖全书十六卷》，或称《全书正宗》[94]。《道藏辑要》中的诸多序言都提到此书[95]。

显然，闵一得对蒋元庭的著作非常了解。此外，在1817年——也就是蒋元庭在杭州的时候，闵一得很可能与他见过面。在《牧斋公传》(载《金盖心灯》)中，闵一得提到蒋元庭为其亲作《闵氏复得祖墓记》之事，该记主要描写闵氏于1817年发现其祖先牧斋公的墓碑，并将它修复的情形[96]。他们可能会互相交流修炼内丹的经验，以及道经的流通情况[97]。根据闵一得的记载，蒋元庭在杭州期间，获悉《金华宗旨》有另外一个版本，与他已经收入《道藏辑要》中的版本不同。这个新版本流传于道教圣地金盖山，正是闵一得当时居住的地方。蒋氏决定要用金盖山的版本替代《道藏辑要》中的传抄讹本，“而板在京邸，及送板归南，而先生又北上，卒于京”[98]。

从蒋元庭传中，我们了解到，蒋氏在1816年确实携其子移居杭州三年，并于1819年返京庆祝嘉庆皇帝六十岁大寿，不久便辞世[99]。

关于《道藏辑要》“送板归南”之事，在闵一得《尹真人东华正脉皇极阖辟证道仙经序》(1831)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今幸《阖辟经》讹本，未纂入《道藏》。《金华宗旨》讹本，虽入藏，而板存姑苏，取以重梓，亦自易易。”[100]

闵一得告诉我们，这些经板当时应该在苏州。正是得益于此板，闵氏才能在《古书隐楼藏书》刊印之前，及时订正《金华宗旨》。

很显然，当时蒋元庭不仅作为吕洞宾道经的编纂者而闻名，而且他还是《道藏辑要》的编纂者。《道藏辑要》经板原是保存在蒋氏北京的家中，在1816年蒋家迁到杭州之后，他打算把这些经板再转运到苏州。我们现在很难弄清，当初蒋氏为何选择苏州。但有意思的是，1815年他的确在此，是年十二月他曾应邀撰写《重修元妙观文昌大殿记》[101]。宋镕和彭定求的曾孙——彭希濂是他的两个朋友，他们生活在苏州，并负责抄写[102]。这说明，至少在道光年间(1821-1850)，经板应该存放于苏州——彭定求的家乡，但是其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103]。

丁福保及其蒋元庭本《道藏辑要》目录

直到20世纪初，我们才又发现这部经藏的些许踪迹。1922年，藏书家丁福保(号守一子，1874-1952)得到《道藏辑要》之后，编辑了一本目录，名为《道藏辑要总目》，后编入《道藏精华录》[104]。丁氏在《道藏辑要总目》提要中说:“是书清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辑，板在京邸，及送板归南，而先生又北上，卒于京。故外间传本甚少。”这段文字与闵一得1834年在《金华宗旨》提要中的叙述颇为相似。这说明，丁福保是读过闵一得的提要的[105]，这也可从多年后丁福保出版了闵一得的作品这一事实得到证明[106]。

丁氏编辑《道藏辑要》目录的根据不仅是他自己藏本中的《道藏辑要总目》，而且还有关于道经内容的相关记述[107]。有意思的是，丁氏藏本中收有两篇新增加的道经——《玉清赞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经》和《玉清赞化九天演政心印宝忏》，这两篇道经未见于1906年版《重刊道藏辑要》。它们都是关于吕祖的经文，经中吕祖被称作“玉清赞化”——此称号赐于1800年，以表“近世道俗所尊奉者，以及民情所信向者非吕仙莫数”[108]之意。

闵一得对《玉清赞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经》是了解的，因为在闵氏的《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中引用了《玉清赞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经》中的文字[109]。然而《玉清赞化九天演政心印宝忏》却是由闵一得的师父沈一炳注释，沈氏将很多他收集的道经传给了闵一得[110]。这两种道经都属于闵一得的教派。1816至1819年间，蒋元庭正居于杭州，很可能注意到了这两种道经。我们可以推断，这些道经后来被收入《道藏辑要》，且时间是在《道藏辑要》的经板被运到苏州之后[111]。现存的《道藏辑要》版本中有一种同丁福保的描述极为吻合，因此能够证实这一假设。

蒋元庭《道藏辑要》的两种现存版本

1933年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中国购得一套《道藏辑要》藏本，并将其捐给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发现了这个藏本。在将这一藏本与丁福保的目录进行对比之后，我意识到这一藏本应该就是蒋元庭的《道藏辑要》[112]。这一藏本中所列道经次序与丁福保的目录相同，而且同丁氏的目录一样，这个“巴黎藏本”也包括上述的两种道经[113]。

1997年，我首次应邀去日本，惊奇地发现日本的多家图书馆藏有不同版本的《道藏辑要》。与“巴黎藏本”不同，这些藏本都不包含那两篇新增道经。几年后，我来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对该所图书馆的藏本(以下称“人文藏本”)进行了分析。将人文藏本和巴黎藏本所列道经的目录进行比较后，我发现，后者比前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者又多出两部道经，收于箕集 10－ 11（参阅图 1：人文藏本与巴黎藏本的《道藏辑要总目》）。

人文藏本（页 15a）

巴黎藏本（页 15a）

图 1：人文藏本和巴黎藏本《道藏辑要总目》（巴黎版新增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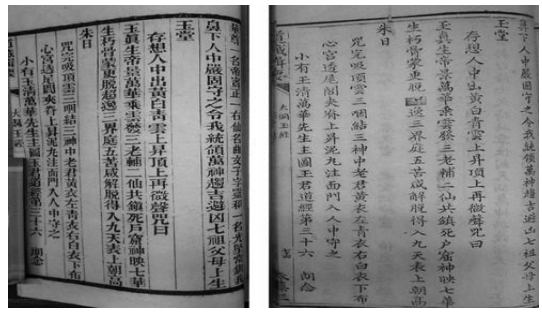
除了这点不同之外，这两种藏本没有其他的不同。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两种版本是由同一经板刊印而出，只不过巴黎藏本增刻了下述内容：1）两种新增经文的目录（页 15a）；2）两种新增经文的内容。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难知道这些增刻的内容究竟是何时被加入《道藏辑要》中的。但是，从其内容上看，的确与闵一得的教义相关，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增刻是在 1800 年之后，很有可能是在蒋元庭在杭州逗留期间（1816－ 1819）或者是在 1819 年经板被运到苏州之后。

通过对不同图书馆收藏的九种蒋元庭版《道藏辑要》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两类版本。为了便于表述，暂且称它们为“人文版”和“巴黎版”[54]。“人文版”中，无论是目录还是正文都不包含上述两种道经及其对应的箕集 10－ 11。相反，“巴黎版”中既包含箕集 10－ 11 的目录，也包含其经文内容。

根据各种序跋的论述，“人文版”应完成于 1805－ 1806 到 1816 年之间，而“巴黎版”可能完成于 1816 年之后[55]。既然我们已经确定现存至少有两种不同版本的《道藏辑要》，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这部经藏的内容。

蒋元庭《道藏辑要》介绍

同明代《道藏》一样，《道藏辑要》的一些藏本也是以三清图作为开篇，其他一些藏本却没有这幅图。现存藏本册数范围在 91 至 280 册之间，原因主要是装订方式的不同，以及卷册、经文、章节和页码的缺失[56]。每页包括十行，每行二十四字。1906 年的二仙庵版每页行数和每行字数与此相同（见图 2：二仙庵版《重刊道藏辑要》与蒋元庭版《道藏辑要》之对比）。



《重刊道藏辑要》（1906 年）　《道藏辑要》（1805/ 1806－ 1816 年）

图 2：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和蒋元庭《道藏辑要》对比

最完整的蒋元庭版《道藏辑要》藏本包括：

* 四篇《序》，除一篇托名“观音”者之外，其余都名为《道藏辑要序》（一、吕洞宾；二、观音；三、钟离权；四、苏郎）[57]；

* 《道藏辑要凡例》12 条（页 1a－ 3a）；

* 《道藏辑要总目》——内容目录（页 4a－ 44b）；

* 按二十八宿字号分集辑录的二十八集道经。每集包含 4 到 12 册分册，用数字标识，如：角集（1－ 7），亢集（1－ 7），氐集（1－ 8）等等[58]。

前六集（角集 1－ 7 到尾集 1－ 7）按照明代《正统道藏》的“三洞”分类，所收道经据称受启于道教三清：元始天尊（其《度人经》为开篇第一经）、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第七集（箕集 1－ 9/巴黎版多出箕集 10－ 11）[59]和第八集（斗集 1－ 11）包含托名玉皇、黄帝所作或与之相关的道经（《阴符经》和《龙虎经》注疏），以及《五斗经》。第九集（牛集 1－ 12）到第十一集（虚集 1－ 11）包括《列子》、《庄子》、《文子》等道家哲学著作的注疏，以及《参同契》、《入药镜》等丹经注释。第十二集（危集 1－ 7）主要是钟吕丹经和净明派道经。第十三集（室集 1－ 7）到第十四集（壁集 1－ 6）是《道藏辑要》的核心内容，包括孚佑上帝吕洞宾所作或与之相关、扶乩降笔而作的道经。第十五集（奎集 1－ 4）到第十七集（胃集 1－ 11）包括南宗和北宗真人和祖师所作道经（其中又以北宗道经为多）。第十八集（昴集 1－ 10）和第十九集（毕集 1－ 6）所收主要为内丹道经，均作于唐朝到明朝这段时间，其中第十九集包括伍守阳（1574－ 1644）的作品。第二十集（觜集 1－ 9）到第二十二集（井集 1－ 6）主要收录道教杂典，如：《真诰》、《道枢》、《云笈七签》。第二十三集（鬼集 1－ 7）包含近期内丹注释道经，如彭定求《真诠》和蒋元庭父亲蒋曰纶（1729－ 1803）著《心传述证录》。第二十四集（柳集 1－ 6）到第二十五集（星集 1－ 7）[60]收录了忏文，朱熹《太极图说》、邵雍《皇级经世书》等一些理学家的注疏，真人传记，以及与文昌、关帝相关的经文。第二十六集（张集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7) 主要收录了戒律与伦理类道经。第二十七集(翼集1–6)和第二十八集(轸1–6)收录了传记、碑文和地方志。

钟离权《序》声称，这部经藏从内容上看，堪称“道藏之精华”。依照吕仙之遗命，由蒋元庭领导的“觉源”或“第一觉坛”[61]的信徒整理并刊印了《道藏辑要》，以“撷全藏之精华，补前藏之遗漏”[62]。1445年明代《正统道藏》以及之前《道藏》的编辑，都是由朝廷发起，主要出于协调政教关系的目的。皇帝委托道士中的精英负责编辑《道藏》。与此不同，《道藏辑要》是高级官员自主编辑的成果。传说是吕洞宾命令他的门徒，在蒋元庭的指导下编辑和刊印一个新《道藏》。但在这部《道藏》中，出现的名字不止有“蒋元庭”(为闵一得和丁福保所用)，还有蒋予蒲以及其它的称呼，如梦因、惠觉、广化弟子或简称“广化子”等。

编者蒋予蒲

蒋予蒲，字元庭(沅庭)、南樵，清朝内阁官员。1755年出生于睢州(河南)的一个官宦世家，1781年考取进士，开始其仕途之路。1794年擢内阁侍读学士，1802年升太仆寺卿[63]。1806年任工部右侍郎，1808年任户部侍郎。虽然身处官场，蒋也倾心宗教有修养的天职。1795年，蒋从广惠寺僧人明心受居士五戒并开始食素[64]。蒋的师父明心俗名王树勋，科考不中，在北京广惠寺出家，后在很多高官中组织扶鸾活动。1792年长夏，蒋与其信奉儒教的父亲蒋曰纶常到明心的寺院参拜，并加入了觉源(第一觉坛)——专门为吕祖所设之扶鸾坛[65]。蒋氏在觉源的法名是“惠觉”或“广化弟子”。蒋的法名可能是为了纪念广惠寺明心和尚点悟其转变，也可能同他与觉坛的关系有关[66]。1803–1805年之间，在当时所存吕祖经典《吕祖全书》的基础上[67]，蒋氏在坛友协助下编辑了一个新版本——《全书正宗》。如前所述，这部16卷的经藏也被称为《吕祖全书》[68]，其中大部分经文都被收入《道藏辑要》的核心卷册[69]。幸有《全书正宗》及其收于《道藏辑要》的新的神启道经，我们才能更多地了解蒋予蒲的宗教信仰，以及他所参加的扶鸾活动和“天仙派”的基础。

蒋予蒲之扶鸾坛：信仰和志向

同早期文人的扶鸾组织一样，蒋予蒲和他的同伴——多为参与宫廷百科全书《四库全书》编撰的官员[70]——对道家的修炼、内丹和神秘教义也深感兴趣。事实上，在明清时期的文人中盛行神仙崇拜，因修炼内丹而证道的陈抟、吕洞宾和张三丰备受尊崇。作为理想的偶像，这些仙人形象通常成为扶鸾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这些作品主要是描写他们的生活、经历的奇闻轶事、神秘教义的传播以及戒律仪规等[71]。

当时撰写此类作品的道家徒众或者私人扶鸾坛随处都是，但涵三宫独以吕祖崇拜有别于其他组织。涵三宫成立于18世纪的湖北地区，是一个特殊而独立的圣坛，专为吕洞宾降笔扶鸾而设。涵三宫不仅是初版《吕祖全书》的源头，也是遍布中国的吕祖信徒关系网的发源地。在独立的吕祖庙出现以前，扶鸾坛通常设于私人家中。中国各个省份在官员的参与下，纷纷设立涵三宫，于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规章制度和修行方式的组织开始形成，其成员都有各自的职能[72]。正是在这个组织中，编辑吕洞宾作品的计划开始成形。

1712年，涵三宫编好了《吕祖全书》中的主要道经，1739年又完成了《参同妙经》[73]。1742年刘体恕和黄诚恕收集了所有经文，按黄诚恕所说，“可谓集《道藏》之大成”。二人随即刊印了《吕祖全书》，共32卷[74]。刘体恕当时正准备刊印一部文昌帝君降笔扶鸾的文集——《文帝全书》(1743)，于是他将吕洞宾经集也命名为“全书”[75]。

涵三宫成为了蒋予蒲扶鸾坛的样板。比如说，涵三宫的大部分经文都被重新刊印在《全书正宗》中，而且，涵三宫所谓的“集《道藏》之大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蒋予蒲的《道藏辑要》中得到体现的。在旧版《吕祖全书》的基础上，蒋予蒲和他的坛友们编辑了新的吕祖经文。这一任务完成之后，他们打算把这些道经放入一本新的道藏之中，并决定将此道藏传播到全国，以表达对吕祖及其教义的最高敬意。这样，这些就其根源来说反映吕祖社团之信仰和修炼的经典，就可以在蒋予蒲新天仙派的名义下，成为更宽泛的道教学说的组成部分。从这方面来说，涵三宫早期的信仰和志向用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新的阐释。此种阐释的一个例子，就是柳棨转化为著名的柳守元的形象。在《吕祖全书》和后来的全真道龙门派道谱中，柳棨是吕洞宾富有传奇色彩的弟子和助手[76]。

在众多据说在蒋予蒲的扶鸾坛上降笔扶鸾的神仙真人中，柳守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作为吕洞宾同其门徒的媒介，柳守元不仅帮助蒋予蒲及其道友编纂《全书正宗》，而且还是蒋予蒲编辑的两部著作中许多序跋的托名作者。此外，柳守元也被说成是《道藏辑要》中一系列新道经的作者[77]。如果说蒋予蒲设坛扶鸾而出的大部分道经是改编而成而不是文学创作的话，那么相比之下，托名柳守元所作的道经则是原创作品——这些道经形成了蒋予蒲扶鸾坛成员的新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守元作为蒋予蒲扶鸾坛的鸾神和监护人[78]，就成为天仙派继创派祖师吕洞宾之后的第二任祖师，享有崇高的地位[79]。

这一新派系实创于蒋予蒲的扶鸾坛上，承载着该坛的信仰、志向、规则和承诺。它成为编辑新的标准《道藏》的动力，而这一新《道藏》据编者言是受了创派祖师吕洞宾扶鸾降笔而作。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吕洞宾的主要角色及其启示

在《道藏辑要》的《序》和《凡例》中，多次清楚地陈述了吕洞宾的主要角色。例如，《凡例》二中说："古今圣真未可数记，妙道真传群推孚佑帝师，非特开南北宗派，传经演典，至大至精，即片语双词，亦必关合道，玄微难名，且奉敕普度，化被四洲。"[80]作为救世主，吕洞宾在老子前面宣布他的计划："编辑诸函，折衷一是。"即是说他要编辑一部标准经藏——《道藏辑要》[81]。藉授权编辑这一新的《道藏》，吕洞宾实现了其信徒世世代代的梦想。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道教真人精心拣选了这些道经，以"综丹道之真传，罗诸真之典要"[82]。总是悲天悯人的吕洞宾"命觉源诸子，编纂《道藏辑要》一书，弃伪而归真，删繁而就简……"[83]

就其本身来说，救世主吕洞宾的神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特别。众所周知，许多所谓的"神圣"经典都使用了神启这一说法，如《圣经》和《古兰经》都被说成是上帝之言（《古兰经》是大天使哲布勒伊来传授给先知穆罕默德的）。道教经典有着与之相似的神启特点。在希伯来宗教中，经典的合法性是通过上帝本人、天使、先知、使徒等说的话得以确立的。与此相似，道教经典的合法性在于"三清"的启示，而佛教经典则常被说成是创始人释迦牟尼之言。

同明代《道藏》一样，这一新编的标准《道藏》据称也得到了"三清"的认可，一些印本的扉页上印有三清图。但整部经藏的编辑实有赖道教使者吕洞宾的神手。吕仙在圣人老子面前发誓要编纂《道藏辑要》[84]。《道藏辑要》是一个优美的神启例子：主要的神人或真人将神圣的经典传授给选定的先知和灵媒。神仙吕洞宾并没有依靠梦或幻觉，而是借助其信徒之手指引书写工具，将其旨意留在覆盖着米粒或沙子的乩盘上（参见图 3：扶鸾坛样例）[85]。

图 3：扶鸾坛（【北京】《点石齐画报丙集》，1884 年版）

这种通过一个特殊装置完成的降灵扶鸾方式，在清代是非常流行的。它通过圣神的干预，为复活一种教义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式。从经典的收集到"标准版"（standardized edition）《道藏》的编纂，都同蒋予蒲的扶鸾坛相关，并且是在该坛的组织下完成的。吕洞宾即降灵于这个坛上，命令其门徒按照圣人老子和所有得道真人的意旨，刊行新的《道藏》，实现他的心愿。

《道藏辑要》——丹道之真传

《道藏辑要》的《凡例》和《序》假托吕洞宾之名，对全书体例和选书标准做了说明。吕洞宾要他的弟子以"综丹道之真传"的标准选出所有道经的精华。此"丹道之真传"的综合构成了《道藏辑要》的核心，《凡例》各条多处理此一任务及其定义。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所谓丹功（《凡例》四）的道旨。在此，有必要将内丹和外功区别开来——"内丹可以超凡入圣，外功只可却病延年"（《凡例》八）。有些道经，看似外功，使用的也是外丹的术语和隐喻，但"其实乃备传丹功之秘"。这些道经，我们要知道如何甄别，《参同契》魏祖心传即是一例（《凡例》六）。

道教修炼的主要目的是"真仙造诣"（《凡例》五）。我们有必要将普通的修炼同这一目的区别开来，在托名钟离权所作的序中提到：食物疗养、导引、吐纳、炼丹、咽津、符咒等等，都代表"小乘"，同"真正觉悟"相去甚远。先前的《道藏》中，不少道经均含有此类无关宏旨的修炼法术，而新《道藏》将舍弃此种道经，只选符合道旨精华之文。选编的宗旨，是简要而非杂芜[86]。因此，一些过于"太涉繁杂"的道经，如《道法会元》、《无上秘要》、《太平经》及《灵宝领教济度全书》等都没有收录（《凡例》九）。基于同样的理由，符箓专本也概不录入（《凡例》十）[87]。相比之下，《灵宝毕法》一书"言皆平实"，与《黄庭内外景经》一样，阐述"长生住世法门"，故两经均得以保留（《凡例》八）。

《道藏辑要》旨在回归道教的精纯，并"补明代《道藏》之遗漏"，因此其基础在于"纯净的内丹理论"。新《道藏》舍弃了符箓专本、炼丹、外功等方面的复杂道经，将选择范围定在内而养性、外而度世、道德伦理、戒律仪轨、道教哲学和丹经的注疏，此外，丹经的诗歌等著作也一并录入。

总而言之，《道藏辑要》反映了在知识分子和扶鸾界中兴起的道教理想主义愿望。这些人热心修炼，潜心于道德的末世神圣和救赎感。这导致在传统儒家背景之外的那些具有佛道教知识且有财力的在家信徒，与那些在朝廷中日益失去声望的道士、法师之间产生了对立。最后，更确切地讲，这部《道藏》表现的是所谓"天仙派"成员的信仰和志向，他们尊吕洞宾为祖，以为其"金丹之法"[88]乃是正统道教的精华。

遗憾的是，这一伟大的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蒋予蒲死后，这部本应得到公认的清代新《道藏》，却只为少数收藏家所珍视，如丁福保。19 世纪末被二仙庵主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持阎永和重新发现之后，它便与孕育它的天仙派和蒋予蒲完全分离了。因为这部经藏强调的是内丹理论的精纯，而不是复杂的道教科仪，因此得到了阎永和及其道教组织的关注，他们决定重刻经板[93]。

1906 年《重刊道藏辑要》以臆想的编者——彭定求之名刊印，并新增了几篇道经。然而，它最终还是替代明代《道藏》流传了下来，而这也正是蒋予蒲及其同伴的初衷。在新的神启出现之前，《道藏辑要》将一直是最后一部《道藏》。

与先前的《道藏》相比，《道藏辑要》就其根源来说是在家信徒的工作成果，表达的也是在家信徒的志向。在吕祖崇拜的强烈驱使之下，这些在家信徒渴望将吕祖崇拜及相关的内而养性、外而度世的经忏与修炼方法传播到全世界。正是这些平凡信徒的鸾坛，以及一位还俗僧人传授给他们的扶鸾活动，才导致了《道藏辑要》的问世[94]。

（责任编辑：郭武）

---

* 本文的早期版本“The Discovery of Jiang Yuanting’s Daozang Jiyao in Jiangnan —A Presentation of the Daoist Canon of the Qing”收于麦谷邦夫主编的《江南道教の研究》（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 年）第 79–110 页并载《學術中國》（*Academic China*，2007 年 11 月）第 25–48 页。此文译自重修后的英文修订稿，后者之 PDF 版可于 http://www.daozangjiyao.org/DZJY_E/Monica_Esposito_CV.html 信息网站查得。

* * 感谢吴露世（Urs App）提供的宝贵意见及对完善这篇文章给予的帮助。

① 跨国研究项目“道藏辑要研究计划”由笔者主持，于 2006 年 7 月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始实施，并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赞助。本项目旨在发掘和整理关于清代道教的各项研究成果。关于这个课题的具体信息详见 http://www.daozangjiyao.org。目前，除了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载《东方宗教》总第 98 期，2001 年，第 33–52 页）、金仑寿《道藏辑要·蒋予蒲》（载《道教文化研究》总第 17 期，2002 年，第 277–316 页）对《道藏辑要》的历史进行研究以外，还没有谁对现存《道藏辑要》的各种版本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感谢森由利亚向本人提供金仑寿的论文，也感谢金志玹帮助翻译了该论文的部分章节。

② 此说法源于赵宗诚的论文《〈道藏辑要〉的编纂与增补》（载《四川文物》1995 年第 2 期，第 27–31 页）。相似观点可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 卷第 453–464 页。还可参阅卿希泰撰：《重刊道藏辑要（缩印本）序》，载陈大利等编辑的十卷本《道藏辑要》（成都：巴蜀书社，1995 年）第 1 卷第 1–3 页；该文也载于《宗教学研究》1996 年第 2 期（总第 31 期）第 1–2 页。在赵宗诚和卿希泰的假设基础上，卞春、李合春在近期论文中对该《道藏辑要》进行了概述（《成都二仙庵历史沿革》，载《弘道》2005 年第 3 期第 92–97 页；《青羊宫二仙庵志》，成都：四川省新闻出版社，2006 年，第 188–194 页）。非常感谢尹志华在丁李的论文刚刚出版之际，便向我提供了该论文。近期互联网上也有不少关于这一题目的文章，如李刚：《道藏辑要》（载“道教文化资料库”，http://www.taoism.org.hk/taoist-scriptures/taoist-canon/pg4-1-4-3.htm）、洪百坚：《道藏辑要》（载道教学术信息网站，http://www.ctcwri.idv.tw/indexD2/D2-13/066-127/13102/071-137/109.htm）。赵宗诚的假设已经被一些西方学者所接受，例如：Elena Valussi：《彭定求》（Peng Dingqiu），载法布里奇奥·普雷加迪奥（Fabrizio Pregadio）主编：《道家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aoism*），伦敦：柯曾出版社（Curzon Press），2008 年，第 2 册第 784–785 页；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著《北京道士，1800–1949》（The *Taoists of Peking*，1800–1949），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7 年，第 275 页。

③ 认为《道藏辑要》的最初版本是由彭定求编辑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例如：李养正主编：《道教手册》（郑州：郑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358–359 页；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道藏辑要》条（该词典第 1064 页的说法是彭定求的最初版本含有道经 283 种，均为道藏精华）。参看注释 5。

④ 赵宗诚：《道藏辑要的编纂与增补》（第 27–29 页）中列出 79 种新增道经的目录，也可参阅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 4 卷第 455–458 页。翁独健在《道藏子目引得》中列出《道藏辑要》所有取自《藏外道经》的目录，收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第 25 期第 38–40 页（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 年）。关于此目录的更多信息，详见莫尼卡：《〈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试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经书目问题》，该论文发表于“第一届道教仙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高雄：中山大学，2006 年 11 月 11–12 日），待刊（PDF 版可于 www.daozangjiyao.org 信息网站查得）。

⑤ 我们注意到，关于《道藏辑要》三个版本到底收录了多少种道书，有不同的说法，如：彭氏版本包含 173、176 或 283 种；蒋氏版本包含 270 种；贺龙骧版本包含 287 种。参阅尾崎正治：《道藏辑要》（载野口铁郎主编《道教事典》，东京：平川出版社，1994 年，第 456–457 页）、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第 1064 页《道藏辑要》条。

⑥ 吉冈义丰主编：《道教经典史论》（东京：道教刊行会，1955 年），第 175–176 页。

⑦ 柳存仁：《〈道藏〉的编辑与历史价值》（The Compilation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Tao-tsang），载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D. Leslie）、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王赓武合编：《中国历史资料文集》（*Essays on the Source of Chinese History*），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 104–119 页（重点参阅第 107–108 页）。在吉冈义丰与柳存仁的研究基础上，其它学者又有进一步的研究，如（以下按时间排列）：王瑞汉：《张三丰全集真伪考》（*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ang San-Feng Ch’uan-Chi*），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7 页；朱利安·帕斯（Julian Pas）所作《序》，载 William Chen 编：《道藏辑要指南》（*A Guide to Tao-tsang Chi Yao*），Stony Brook N. Y：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1987；朱越利：《道经总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328 页；王卡《道藏辑要》，载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30 页；田诚阳：《道经知识宝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09 页。

⑧ 碧仁：《道教典籍百问》（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年），第 216–218 页。

⑨ 《道藏辑要》编者的争议点主要在第一种说法上，参阅莫尼卡：《〈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

⑩ 参阅莫尼卡：《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La Porte du Dragon—L’école Longmen du Mont Jingai et les pratiques alchimiques d’après le Daozang xubian*，第七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93 年），第 1 册第 4、158、162–163 页；莫尼卡：《清代道教》（*Daoism in the Qing*），载利维娅·科恩（Livia Kohn）主编：《道教百科》（*Daoism Handbook*），荷兰：Brill 出版公司，2000 年，第 623–658 页（重点参阅第 634–635 页）。碧仁《道教典籍百问》中《〈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和金仑寿《道藏辑要·蒋予蒲》，都认为《道藏辑要》的真正编者是蒋元庭。此外还可参阅卿希泰主编：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道教》(上海: 知识出版社, 1994 年), 第 2 卷第 32- 33 页。

⑪例如, 台湾"国家图书馆"网 (http: //nbinet. ncl. edu. tw) 或中国国家图书馆网 (http: //www. nlc. gov. cn/en/collections/Bbooks. htm), 馆藏的《道藏辑要》版本均清楚标明"(清) 彭定求等编"或"彭文勤等纂辑、贺龙骧校勘"。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馆藏目录 (http: //las. sinica. edu. tw/) 中《道藏辑要》版本也标明"彭元瑞 (1731- 1803) 纂辑"。关于彭元瑞, 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论及。

⑫10 卷本《道藏辑要》(陈大利等编) 共有两篇《序》: 一篇是任继愈 1985 年为巴蜀书社《重刊道藏辑要》重印本所作之《序》(《重刊道藏辑要》经板修复后由巴蜀书社重新刊印, 共 32 匣 314 卷), 其中并没有提及《辑要》的编者。另一篇为卿希泰 (1995 年) 所作, 主要是关于三个版本的介绍 (见上注 2)。更多关于《重刊道藏辑要》(1906 年版) 及其编者的信息, 请参阅莫尼卡: 《〈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

⑬阎永和与彭涵瀚然在他们的序言 (分别是《重刊道藏辑要源起》, 页 15a/行 4; 《重刊道藏辑要弁言》, 页 16a/行 3, 收于《重刊道藏辑要》,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1 册第 44 页) 中都提到了经板已经损坏, 但贺龙骧 (《校勘道藏辑要书后》, 页 17b/行 8- 9, 收《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45 页) 的说法是"惜板存京城久遭蠹蚀"。我们接下来对《道藏辑要》经板的命运有更多的交代。以下所言《道藏辑要》均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年重印的 25 册版《重刊道藏辑要》。

⑭阎永和: 《重刊道藏辑要缘起》, 页 15a- b (《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44 页)。但贺龙骧在《校勘道藏辑要书后》页 18a (《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45 页) 提及他是以何起重和秦芃生二藏书家手抄本为校勘底本。参阅莫尼卡《〈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

⑮《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46 页。贺龙骧所提到的"总目"是指《道藏辑要总目》, 这篇目录包含在严雁峰藏本内。更多详情参见下文。

⑯《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303 页。也可参阅王瑞汉: 《张三丰全集真实性考》第 3- 4 页。

⑰《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45 页。

⑱关于《彭定求传》, 参见《清史稿》第 480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977 年) 第 43 册第 13155 页。Rufus O. Suter《彭定求》(*P' eng Ting- ch' iu*), 载恒慕义 (Arthur W. Hummel) 主编: 《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台北: 成文出版公司, 1970 年) 第 616- 617 页。关于官名的问题, 赵宗诚先生在《〈道藏辑要〉的编纂与增补》注 3 中说: "贺龙骧对彭定求, 前称相公, 此处称相国, 在《校勘道藏辑要书后》又称相国彭文勤《道藏辑要》, 则彭定求又名文勤。……《清代职官年表》中亦无彭定求之名。不知贺氏所称相国是相公之误还是另有所指?" 另请参阅卿希泰主编: 《中国道教史》第 4 卷第 459 页注 1、金仑寿: 《道藏辑要• 蒋予蒲》第 282- 283 页。

⑲"彭启丰 … 谥文勤"。参阅窦镇编: 《国朝书画家笔录》(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1 年) 第 1 卷, 页 55a; 森由利亚《重刊《道藏辑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 载岡崎由美主编《中國古籍流通學の確立: 流通する古籍? 流通する文化》(东京: 雄山出版社, 2007 年) 第 339- 401 页, 此处引文见第 351 页。关于彭元瑞, 他在嘉庆初年被命修订《高宗实录》。少年时的彭元瑞与蒋士铨并称"江右两名士", 1789- 1791 年官至工部尚书。参阅《清史稿》第 320 卷 (第 36 册第 1769- 1770 页) 和 Tu Lien- che《蒋士铨》(*Chiang Shih- ch' üan*), 载恒慕义 (Arthur W. Hummel) 主编: 《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第 141 页。按照金仑寿 (《道藏辑要• 蒋予蒲》第 282- 83 页) 和万德凯 (《〈道藏辑要〉研究》, 博士后论文, 四川大学, 2007 年初夏, 第 8- 10 页) 的看法, "相国"的官衔和"文勤"的谥号都指的是彭元瑞。感谢万博士于 2007 年 7 月 15 日寄给我一本他的著作。

⑳万德凯: 《〈道藏辑要〉研究》, 第 10 页。

㉑参阅莫尼卡: 《〈金华宗旨〉不同版本及其与龙门派的关系》(*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men School*), 载《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总第 43 期 (1998 年) 第 90- 109 页, 此处请参阅第 95 页注 17 和第 103- 105 页。还可参阅笔者的《清代における金盖山の成立と金华宗旨》, 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中国宗教文献研究》(京都: 臨川書店, 2007 年, 第 261 - 262 页)。参阅下注 43。

㉒分别见《清史稿》第 304 卷 (第 35 册第 10503 页) 和第 480 卷 (第 43 册第 13155 页); 参阅卿希泰主编: 《中国道教史》第 4 卷第 454 页注 1。《玉诠语录》页 78b/行 4 (《重刊道藏辑要》第 13 册第 5753 页) 中说彭定求是 1676 年的状元。

㉓蒋、汤均祖籍遂州睢州, 至蒋元庭已经五代, 有意思的是, 蒋元庭的母亲和夫人也都与汤斌有关系。参阅金仑寿: 《道藏辑要• 蒋予蒲》第 291 页。

㉔他在家乡组织的第一次活动是仿效高攀龙 (1562- 1626) 创立的豆腐会的一次食斋活动。参阅 Rufus O. Suter: 《彭定求》(*P' eng Ting- ch' iu*), 载恒慕义 (Arthur W. Hummel) 主编: 《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第 617 页, 富路德 (L. Carrington Goodrich) 和房兆楹合: 《明代名人传, 1368 年- 1644 年》(*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 1644,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6 年) 第 701- 710 页。《梅庵年谱》所含道诗, 参阅金仑寿: 《道藏辑要• 蒋予蒲》第 283 页。

㉕扶乩或称扶鸾、飞鸾、降鸾和降笔等, 是明清时期最常见的一种占卜方式, 在政府官员、文人及普通平民中均非常流行。它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文人和官员的信仰, 他们希望通过扶乩询问能否通过考试或获得官位。明清时代, 在科考期间, 扶鸾活动更为普遍, 以至于在每个郡县几乎都能发现"乩坛"。参阅焦戴维 (David K. Jordan) 和欧大年 (Daniel Overmyer) 合著《飞鸾: 台湾之中国民间教派面面观》(*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第 40- 41 页。参阅下注 85。

㉖彭定求不仅热衷于道教修炼法 (参阅他作于 1710 年的《真诠序》, 收于《重刊道藏辑要》第 21 册第 9159 页), 而且致力于扶乩活动。《玉诠语录》(《重刊道藏辑要》第 13 册第 5753 页) 的提要中, 指出这篇经文作于彭氏在苏城 (苏州) 的一座名为"玉诠"的乩坛。而且, 在《洞经示读》(据说是文昌帝君降灵所作, 时间为 1728 年, 收于《重刊道藏辑要》第 3 册第 1174- 1175 页) 序中, 彭定求的名字与文昌崇拜相关。关于此点, Rufus O. Suter (《彭定求》第 617 页) 指出, 彭有时在文帝 (文昌) 庙向年轻村民讲经。

㉗正如金仑寿在《道藏辑要• 蒋予蒲》(第 285- 286 页) 中所强调的, 贺龙骧对道经作者的论断似不可靠。例如《钦定道藏全书总目》页 14a (《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310 页) 中, 他认为《修真十书》的作者是石泰 (? - 1158), 但是众所周知, 石泰只有一部著作, 即《还源篇》。另外, 《国朝坊刻道书目录》页 14a- b (《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352 页) 中的《道言五种》的经板刻于咸丰年间 (1854 年), 但是贺氏说该书为宋人翁葆光所辑 (1173 年)。从该经藏的内容上看, 很容易确定编者为陶素耜 (1676 年), 他是清政府官员, 是仇兆鳌 (1713 年) 的好友, 而仇非常热衷于道教内丹修炼。

㉘关于这位大师的生平和作品, 可参阅莫尼卡: 《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 还可参阅笔者的一则简短的英文介绍《闵一得》, 载法布里奇奥• 普雷加迪奥主编: 《道教百科全书》第 2 册第 747- 748 页。最近, 有很多关于闵一得的中文文章发表在各种中文期刊上。例如, 吴亚魁: 《闵一得生年考疑》, 载《宗教学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4年第3期) 第140–148页; 已在《中国道教》上发表并能在网络上找到的有: 谢正强: 《闵一得小考二则》, 载《中国道教》(2004年1月; http://big5.chinataoism.org/content.php?catid=1077#78); 刘焕玲: 《试析闵一得之龙门方便法门》, 载《中国道教》(2005年5月; http://big5.chinataoism.org/showtopic.php?id=9370); 王宗耀: 《闵一得生年考疑》, 载《中国道教》(2005年6月; http://cn.qikan.com/b5qikan/view_article.asp?titleid=zgdj20050617)。此外还有一些日文文章, 如莫尼卡: 《清代道教と密教——龙门西竺心宗》, 内容是关于闵一得的生平及他与密宗的关系, 载麦谷邦夫主编: 《三教交涉论丛》(京都: 人文化学研究所, 2005年) 第287–338页, 重点参阅第294–306页 (http://www.zinbun.kyoto-u.ac.jp/cgi-bin/kyodo-pub.cgi?pub-sort.csv)。

㉙《重刊道藏辑要》第8册第3192页。作者蒋元庭用“道藏”代替“道藏辑要”, 并且在跋中自称为“立甫山人”。他的其它名字详见下文。

㉚参阅闵一得: 《阴符经正义序》(《古书隐楼藏书》), 载胡道静主编: 《藏外道书》(成都: 巴蜀书社, 1992年) 第10册第296–297页。在范宜宾的注释之前, 闵一得已经引述了《道藏辑要》中的所有《阴符经》的注释。

㉛《金华宗旨》页3a (《藏外道书》第10册第328页)。

㉜《金华宗旨》页3a (《藏外道书》第10册第328页)。

㉝参阅《藏外道书》第10册第354页。关于《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的部分翻译和陈述, 及相关的阐释吕洞宾金盖山医世宗核心教义的经书, 请参阅莫尼卡: 《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 第1册第246–279页; 《清代中国道教的龙门派: 理想教义与社会实践》 (*Longmen Taoism in Qing China: Doctrinal Ideal and Local Reality*), 载《中国宗教》(*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总第29期 (2001年) 第191–231页, 重点参阅第213–221页; 《清代における金盖山の成立と金华宗旨》第239–264页。参阅森由利亚: 《吕洞宾と全真教–清朝湖州金盖山の事例を中心に》, 载野口铁郎主编: 《道教の神々と経典》(东京: 雄山阁, 1999年) 第242–264页, 重点参阅第250–260页。

㉞朱珪 (1732–1806) 作于1803年的《全书正宗后序》中有“吕祖全书十六卷”字样, 序中对此经藏有所引述, 并称该经藏编辑者是“蒋太仆予蒲” (即蒋元庭, 见《全书正宗后序》卷首, 页1a, 收入蒋予蒲主编: 《全书正宗》第十六卷, 1805年版)。参阅莫尼卡: 《〈金华宗旨〉不同版本及其与龙门派的关系》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men School*) 第94–95、103–104页; 森由利亚: 《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36–43页及下文。

㉟参阅吴凤洲和蒋予蒲 (蒋元庭) 所作《十六品经后跋》(《重刊道藏辑要》第12册第5340页), 及下注㊸。也可参考金仑寿的研究 (《道藏辑要·蒋予蒲》第296–303页), 他认为这个集子有可能就是《吕祖全书正宗集成》。

㊱《金盖心灯》第7卷, 页17b/行7–8, 载杜洁祥主编: 《道教文献》(台北: 丹青图书有限公司, 1983年) 第11册第588页。转引自金仑寿: 《道藏辑要·蒋予蒲》第296页。

㊲闵一得在《尹真人东华正脉皇极阖辟证道仙经》(《重刊道藏辑要》第10册第367–383页) 中引述蒋元庭的内丹修炼观点, 在提及蒋元庭时用的是他的号“南樵子”。对于蒋氏将《金华宗旨》视为中宗的观点, 闵一得发表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参阅莫尼卡: 《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第1册第184–221页和第205–210页; 《〈金华宗旨〉与金盖山龙门派的关系》 (*Il Segreto del Fiore d'Oro e la tradizione Longmen del Monte Jin'gai*), 载科拉地尼 (Piero Corradini) 主编: 《解读中国文明》 (*Conoscenza e interpretazione della civiltà cinese*, 威尼斯: Cafoscarina, 1996年) 第151–169页, 重点参阅第163–169页。另请参阅金仑寿: 《道藏辑要·蒋予蒲》第306–312页。

㊳参阅闵一得为《金华宗旨》写的序言 (《藏外道书》第10册第328页), 其开头部分已在前文中引述, 兹将全文引录如下: “是书出于康熙戊辰, 金盖龙峤山房宗坛所传, 本山先哲陶石庵先生寿诸梓。嘉庆间, 侍郎元庭先生得传抄讹本, 纂入《道藏辑要》。后在浙省见本山梓本, 议即改梓。而板在京邸, 及送板归南, 而先生又北上, 卒于京; 事故中止。此未了要事, 一得之心, 不能刻忘也。今岁游金陵, 得世所传誊本, 亦与陶本不尽合, 而较蒋本多收一二节, 似又出自陶本者, 各以私意增损, 言人人殊, 何以信后。兹一准陶本订政之。”

㊴参阅胡敬为蒋元庭 (原名蒋予蒲) 作的《墓志铭》, 收入李桓辑 (1884至1890年之间):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94卷附录 (载周骏富主编: 《清代传记丛刊》, 台北: 明文书局, 1985年, 第146页、183–188页, 重点参阅第188页)。更多关于蒋予蒲的信息, 参阅森由利亚: 《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36–37页和金仑寿: 《道藏辑要·蒋予蒲》第290–295页。笔者非常感谢森由利亚提供的有关蒋予蒲传的资料。

㊵《藏外道书》第101册第367页。关于这篇有趣的序言的完整翻译, 请参阅莫尼卡: 《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第1册第185–188页。

㊶参阅蒋予蒲: 《重修元妙观文昌大殿记》, 载《重刊玄妙观志》第10卷, 页12b–13a (《藏外道书》第20册第501–502页)。转引自金仑寿: 《道藏辑要·蒋予蒲》第294页。

㊷参阅金仑寿: 《道藏辑要·蒋予蒲》第292–293页。他在309页中认为《道藏辑要》的经板有可能保存在宋镕家中。

㊸彭定求之孙——彭启丰的家中应该保存有一个《全书宗正》的古版。正如《道藏辑要》的多篇序中所提及的, 这一古版是蒋元庭编辑《全书正宗》依据的底本之一。蒋氏《全书正宗》的《凡例》中提到: “是集系就《宗正》原本重订, 恭检《全书》, 刘体恕所刻三十二卷, 邵志琳所刻六十四卷。” 1852年陈谋修复了《全书宗正》的经板, 并以《吕祖全书宗正》之名刊印, 共18卷。参阅莫尼卡: 《〈金华宗旨〉的不同版本及其与龙门派的关系》第95页注17、第103–105页, 及《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の成立と金華宗旨》第261–262页。

㊹《道藏精华录》, 上海: 医学书局, 1922年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年再版)。这部经藏既收有明代《道藏》的经书, 也收有清代《道藏辑要》的经书。关于这一经藏的简单介绍, 参阅Judith Boltz: 《道藏精华录》, 载法布里奇奥·普雷加迪奥主编: 《道家哲学百科全书》第1册第340–341页。

㊺将这段文字与注38中的引文 (尤其是划线部分) 对比, 其义可明。

㊻这部著作名为《道藏续编》, 初版为1834年木版印刷, 题页印有金盖山字样, 包含道经23种, 均为《古书隐楼藏书》的主要道经, 开篇为《金华宗旨》。福保购买该藏本后, 决定以雕版形式再次排版印刷, 并于1952年出版了《道藏续编初集》(上海: 医学书局)。该书于1989年 (北京: 海洋出版社) 和1993年 (北京: 书目文学出版社) 以小字号再版。参阅《道藏续编》中的《编辑说明》及守一子 (即福保) 写的说明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9年)。其它关于这部经藏的信息, 请参阅莫尼卡: 《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 及法布里奇奥·普雷加迪奥主编: 《道教哲学百科全书》中《道藏续编》条 (第1册第347–350页)。

㊼将福保所列的道经题目、卷数、章节和作者等信息与蒋元庭的《道藏辑要总目》进行对比, 便可证明这一点。参看莫尼卡: 《〈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附录1。《道藏辑要总目》最初应该包含在蒋元庭《道藏辑要》中, 贺龙骧重新编订时命名为《重刊道藏辑要总目》(《重刊道藏辑要》第1册第12–31页)。

㊽参阅萧抡: 《金盖心灯序》(1817年版) 页1a/行3–5 (收入杜洁祥主编: 《道教文献》第10册第5页), 其中提到: “而近世道俗所尊奉者莫吕仙若。今天子御极之五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因民情所信向，特赐‘玉清赞化’四字，以褒崇之。”

㊾参阅《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藏外道书》第 10 册第 348 页），其中闵一得引用了《玉清赞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经》（页 6a－b）中的经文，该经文收于包括箕集 10 的《道藏辑要》的部分版本（参阅下文）。经文中说：《心印集经》曰：“青尼致中，仲尼时中，牟尼空中。”参阅莫尼卡：《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第 1 册第 254－255 页。

㊿《沈一炳传》见于闵一得的《金盖心灯》。这位大师传给闵一得的道经主要是与天仙心传、天仙戒忌等和医世宗传统相关的道经（参阅注 33），也有一些关于女丹修炼方面的道经。关于沈一炳以及他传授道经的其它情况，请参阅莫尼卡：《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第 1 册和《清代中国道教的龙门派》第 213－221 页。

51金仑寿（《道藏辑要·蒋予蒲》第 299－300 页）认为这两篇道经可能是蒋元庭在 1801 年之后才加入《道藏辑要》中的。

52莫尼卡：《龙门派——金盖山龙门派与〈道藏续编〉中的内丹法》第 1 册第 4 页。

53例如，福保的《道藏辑要》目录与蒋元庭《道藏辑要总目》中的道经排列次序不同，另外，“巴黎藏本”（同福保的目录一样）不包括一篇名为《汉天师世家》的道经。参阅莫尼卡：《〈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

54关于《道藏辑要》藏本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该研究是《道藏辑要》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在“人文版”类（以其目录和未收入的两篇道经为基础）目下，我们将列出蒋元庭《道藏辑要》的其它藏本，例如，东京大学（两种藏本），东洋文库和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保存的藏本。在“巴黎版”类（目录和内容中均有上述两种道经）目下，将列出一个藏于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本子，中国白云观以及一个保存在台湾国家图书馆的本子（遗憾的是，后一个本子有缺失，如没有第一卷，因此也没有目录）。参阅莫尼卡：《〈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

55在蒋元庭《道藏辑要》中，完成最晚的序跋时间是 1805 年（托名柳守元的《元始大洞玉经》的跋名为《宏教真君后跋》，收入《重刊道藏辑要》第 3 册第 1173 页；托名柳守元的《玉皇本行集经跋》，收入《重刊道藏辑要》第 7 册第 2585 页；托名玉皇上帝的《玉皇本行集经阐微序》，收入《重刊道藏辑要》第 7 册第 2743 页）。还有三篇《玉皇本行集经阐微》的序（《重刊道藏辑要》第 7 册第 2826－2829 页）可能作于 1806 年。这意味着第一版完成于 1805（1806）年之后，但是在 1816 年蒋元庭迁往杭州之前，因为闵一得提到经板在那时已经保存在北京蒋氏家中。根据金仑寿的考证，《道藏辑要》刊印于 1817 年之前（《道藏辑要·蒋予蒲》第 29 页）。也请参阅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 48 页。

56所有现存的《道藏辑要》藏本除章节、页码有缺失外，至少有一篇或更多道经亡失。例如，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本遗失三整册。贺龙骧说，甚至《重刊道藏辑要》的底本——严雁峰家藏本（最完整的蒋元庭《道藏辑要》藏本）也缺少壁集第三册。参阅贺龙骧《校勘道藏辑要书后》页 18a/行 8－9：“先是严雁峰交来，即少‘壁’集第三册。脱页黑墩，数难校举。”（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45 页）。参阅莫尼卡：《〈道藏辑要〉及其编撰的历史》。

57正如碧仁（《道教典籍百问》，第 217 页）所述，严雁峰家藏本（1906 年版《重刊道藏辑要》的底本）包括四篇序，但除此之外，其他我所参考的蒋元庭《道藏辑要》藏本都仅包含一篇或两篇序（托名为苏郎和钟离权所作）。在《重刊道藏辑要》的四篇序中，有三篇名为《道藏辑要原序》。托名观音所作的序名为《观音大士弁言》。参阅《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6－10 页；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 35－36 页。

58这种分集方法是以蒋元庭《道藏辑要》（人文版）的内容、《道藏辑要总目》及其夹注为基础。关于《重刊道藏辑要》的内容，参阅法布里奇奥·普雷加迪奥：《道藏辑要》，载法布里奇奥·普雷加迪奥主编：《道教哲学百科全书》第 1 册第 341－345 页。

59本集收有与“玉清赞化”吕洞宾相关的两篇新增道经；参阅上注 48。

60虽然人文版类和巴黎版类的蒋元庭《道藏辑要总目》标明有“星集 8”，可实际上，所有我查阅过的藏本都止于“星集 7”。参阅莫尼卡：《〈道藏辑要〉及其编纂的历史》。

61此鸾坛在《道藏辑要》中有不同的名字，参阅森由利亚：《认同与传承——太乙金花宗旨及清代中国的吕祖扶鸾崇拜》（*Identity and Lineage—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载利维娅·科恩（Livia Kohn）和罗浩（Harold Roth）合著：《道教认同》（*Daoist Identity*，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2000 年）第 165－184 页，重点参阅第 174－175 页；《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 38－41 页。

62参阅托名钟离权的《道藏辑要原序》（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8 页）。

63参阅胡敬所辑《蒋予蒲传》及其《墓志铭》，收入李桓主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 94 卷，页 37b（载周骏富主编：《清代传记丛刊》第 146、163 和 146 页）。在《蒋予蒲传》页 35b/行 10（第 146、160 页）出现的年份是 1801 年，但在墓志铭（第 146、185 页）中出现的则是 1802 年。

64参阅《蒋予蒲传》，收入李桓初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 94 卷，页 37b（载周骏富主编：《清代传记丛刊》第 146、160－163 页）；王先谦主编：《东华续录》《嘉庆三十九》页 12a（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375 卷第 163 页；《清会典事例》第 112 卷（载《史部》第 96 页，《处分例·僧道度牒》第 35 页，收入《中央研究院电子数据》，448－1，448－2）。关于明心（王树勋）劝导蒋予蒲食素，参阅陈康祺（1840－?）：《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 2 册，三笔，第 1 卷第 34 页（《蒋予蒲见理不明》，载《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 册第 664 页。

65参阅蒋曰纶：《忏法大观序》（1803 年，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21 册第 9220 页），说他和他的儿子蒋予蒲于 1792 年长夏经常参拜广惠寺。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明心向他们介绍了扶鸾及其仪式（金仑寿：《道藏辑要·蒋予蒲》第 293 页）。在序中，蒋曰纶在介绍他和其子拜访广惠寺之前，提到在结识明心法师之前，他“初不知仙佛之道与吾儒相通也”。在明心的指点下，他们在广惠寺开始尝试“性命之功”。明心法师传授的教义同内丹和重要的道教经典《金华宗旨》有关（参阅《金华宗旨》12 节，页 31b/行 5，载《藏外道书》第 10 册第 342 页，及下注 66）。蒋曰纶在序中尤其提到“天仙大法宗旨”，该法不依靠饮食、丹药外功等小法。“天仙大法宗旨”在蒋予蒲的鸾坛、天仙派传承乃至《道藏辑要》的编辑中均占有核心地位。如能将该序中提到的“宗旨”观点同《道藏辑要》的《凡例》（尤其是第五项）以及托名钟离权的《道藏辑要序》作一比较，将会是一件有趣的事。至于明心（俗名王树勋），他在科考落榜之后，在北京广惠寺出家为僧。他在很多高官中组织扶鸾活动。这些高官中有蒋予蒲、庞士冠及其它人。他因此事受到批评，被判还俗。1815 年明心靠贿赂买官，事发后被发配到黑龙江。蒋予蒲、宋镕和明心的其他门徒都受了牵连并被革职。参阅昭槤（1776－1830）：《啸亭杂录》第 8 卷《王树勋》（收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236 页；《石承藻传》，收入《清史稿》第 356 卷（第 337 册第 11319－11320 页）。

66此观点为金仑寿（《道藏辑要·蒋予蒲》第 295 页）所提出。有趣的是，闵一得在《金华宗旨》序中提到王和尚（王树勋）是蒋元庭的师父。参阅《金华宗旨》12 节，页 31b 行 5（载《藏外道书》第 10 册第 342 页）。

67首版《吕祖全书》（32 卷）是刘体恕于 1744 年刊印的。1775 年由邵志琳增刊至 64 卷。参阅注㊸及下文。

68参阅注㊹。另请参阅托名柳守元所作之序（《全书正宗总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序》，卷首，页 38b– 39b，载蒋予蒲《全书正宗》)，其中提到惠觉（蒋予蒲）在其他坛友的帮助下，对该经藏进行了修订。

⑲除了《禅宗正旨》、《金刚经注》及附在该经后面的《心经注》外，其余的 17 种道经均收于《道藏辑要》:

1.《孚佑上帝纯阳吕祖天师十六品经》（第 13 集，室集 1，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2 册第 5293– 5340 页）;

2.《金华宗旨》(第 13 集，室集 2，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2 册第 5349– 5382 页）;

3.《同参经》（第 13 集，室集 3，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2 册第 5383– 5415 页）;

4.《五经合编》(第 13 集，室集 4，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2 册第 5417– 5442 页）;

5.《吕帝文集》(第 13 集，室集 5，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2 册第 5443– 5507 页）;

6.《吕帝诗集》(第 13 集，室集 6– 7，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3 册第 5511– 5622 页）;

7.《太上道德经解》(第 5 集，心集 1，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4 册第 1673– 1726 页）;

8.《先天斗帝救演无上玄功灵妙真经》(第 8 集，斗集 1，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7 册第 2867– 2879 页）;

9.《玉枢宝经》(第 8 集，斗集 11，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8 册第 3504– 3512 页）;

10.《易说》(第 14 集，壁集 1– 2，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3 册第 5623– 5714 页）;

11.《传道集》（第 12 集，危集 2，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2 册第 5113– 5142 页）;

12.《天仙金丹心法》（第 14 集，壁集 6，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3 册第 5859– 5993 页）;

13.《玄宗正旨》(第 8 集，斗集 4，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8 册第 3045– 3057 页）;

14.《十戒功过格》(第 8 集，张集 3，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23 册第 10309– 10339 页）;

15.《警世功过格》(第 25 集，张集 3，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23 册第 10339– 10353 页）;

16.《圣迹纪要》（第 14 集，壁集 5，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3 册第 5831– 5857 页）;

17.《语录大观》（第 14 集，壁集 3，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13 册第 5715– 5778 页）。

⑳蒋予蒲的很多朋友都是高官，其名字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被提及。参阅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 40– 41 页和金仑寿:《道藏辑要·蒋予蒲》第 291 页。

㉑参阅合山究:《明清の文人とオカルト趣味》，载荒井健主编《中華文人の生活》（东京: 平凡社，1994 年）第 469– 502 页，以及志贺市子《中国のこっくりさん: 扶鸞信仰と華人社会》（东京: 大修馆书店，2003 年）第 124– 125 页。

㉒参阅黄诚恕的《参同妙经序》（第 16 卷，页 3a– 4b）和《清微三品经序》(第 13 卷，页 3a– 4b)，载刘体恕主编:《吕祖全书》第 32 卷。笔者曾使用过 1868 年版本（1879 年增入一篇序)，共 33 卷(包括《禅宗正指》)，印自湘潭崇善堂藏板。这个版本保存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参阅马晓宏:《道藏等诸本所收吕洞宾书目简注》，载《中国道教》1988 年 3 期第 34– 37 页。

㉓参阅《吕祖全书涵三宫杂咏小序》(第 27 卷，页 1a)，其中提到《三品经》的神启发生在 1712 年，而《参同经》的神启则是在 1730 年。这两篇道经经蒋予蒲修订后，刊印在他的《全书正宗》中。《三品经》成为《十六品经》的一部分，而且被置于篇首；参阅注 69。

㉔参阅黄诚恕:《吕祖全书序》页 3a。

㉕参阅黄诚恕:《吕祖全书跋》第 32 卷，页 9a。

㉖例如，柳棨被认为是《三品经》跋的作者（《吕祖全书》第 15 卷，页 21a)。在《柳真君诰》中，他作为“吕祖首座弟子”的形象出现（《吕祖诰》，收入《吕祖全书》第 32 卷，页 6a)。在全真道龙门派中，柳棨也被说成是“纯阳帝君”的首席弟子；参阅《道谱源流图》，收入《金盖心灯》页 3a（第 10 册第 23 页)。正如森由利亚所强调的，蒋予蒲在《全书宗正》和《道藏辑要》中刊印了同一篇《三品经》之跋，但署名为“柳守元”。参阅《柳祖师三品经后记》页 87b/ 行 10（《重刊道藏辑要》第 12 册第 5338– 5339 页)。更多信息请参看森由利亚:《清朝全真教の伝戒と吕祖扶乩信仰》，载福井文雅博士《古稀·退职记念论集》刊行会主编:《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仪礼》(東京: 春秋社，2005 年）第 441– 461 页，重点参阅第 451– 457 页。

㉗参阅《三坛圆满天仙大戒略说》(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24 册第 10457– 10468 页）和《清微宏范道门功课》(载《重刊道藏辑要》第 23 册第 10213– 10235 页)。关于这两篇道经，参阅森由利亚:《清朝全真教の伝戒と吕祖扶乩信仰》和森由利亚:《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と全真教》，载堀池信夫和砂山稔合:《道教研究の最先端》(东京: 大河书房，2006 年）第 82– 108 页。

㉘1789 年以后，柳守元被蒋予蒲的扶鸾坛接纳；参阅森由利亚:《清朝全真教の伝戒と吕祖扶乩信仰》第 451 页。

㉙志秋（范鏊，1780– 1803）在其《金华宗旨序》(页 4b/ 行 8）中对此有清楚的说明（《重刊道藏辑要》第 12 册第 5382 页)。他称柳守元为“宏教恩师”，是天仙派二祖。

㉚参阅《道藏辑要凡例》第二条，页 1a（《重刊道藏辑要凡例十六则》)；页 12a(第 1 册第 10 页)。关于《道藏辑要》序跋的介绍，请参阅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 43– 47 页。

㉛参阅托名吕洞宾的《道藏辑要序》页 4a（《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6 页)。另请参阅《道藏辑要凡例》页 1b（《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10 页)。

㉜参阅托名苏郎的《道藏辑要原序》页 10b（《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9 页)。

㉝兹将全文录下:“命觉源诸子，编纂《道藏辑要》一书，弃伪而归真，删繁而就约；广大精微，而天人之道备。”参阅托名钟离权的《道藏辑要原序》页 8a（《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8 页)。

㉞参阅托名吕洞宾的《道藏辑要原序》页 4a（《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6 页)，及前注㉛。

㉟神仙、神人、真人和过去时代的高人名士据说都可以降灵于扶鸾坛上。扶鸾坛通常为一“T”字型木架，一段呈突出的尖状。一人或二人站在坛桌旁手执手柄。当此装置开始“自动”移动时，突出的尖部就会在“乩盘”或“沙盘”上绘出神奇的图表或文字。对扶鸾坛周围的信徒来说，这些图表或文字可以预测未来，诊断疾病，发布道德训诫，传达各种教义（篇幅从短句到卷帙浩繁的经文)。关于各种扶鸾设备或书写工具的描写，请参阅焦戴维和欧大年合著:《飞鸾: 台湾之中国民间教派面面观》第 32– 33、38、45 页等处；合山究:《明清の文人とオカルト趣味》第 469– 502 页；志贺市子《中国のこっくりさん: 扶鸞信仰と華人社会》第 2– 12 页及前注㉕。

㊱参阅托名钟离权的《道藏辑要序》页 8a（《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8 页）和《道藏辑要凡例》页 12b– 14a(第 3、5、10 条;《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10– 11 页)。

㊲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道藏辑要》也包括科仪道经和祛邪道经，如《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重刊道藏辑要》第 8 册第 3253– 3449 页)。这篇道经最早见于《道藏》(CT 1219)。参阅施舟人和傅飞岚合著三卷本《道藏通考》（芝加哥和伦敦: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 卷第 1094– 1095 页。

㊳参阅徐震:《天仙金丹心法序》页 78b（《重刊道藏辑要》第 13 册第 5933 页）和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 41– 42 页。

㊴正如二仙庵主持阎永和所强调的，成都（四川）全真龙门派的二仙庵之所以重新编辑《道藏辑要》，是因为在当时的道教界，虽然多的是科仪道经，但内丹道经却十分罕见。参阅阎永和:《重刊道藏辑要缘起》页 15a（《重刊道藏辑要》第 1 册第 44 页)。

㊵指蒋予蒲的佛门师父明心，俗名王树勋。参阅上注㉟和㊱。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